

诗云: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那烟是什么烟?说是狼烟,烽火台上点起的,想到狼烟就有点爱国主义了,也厚重,让诗句有了历史感。我说是炊烟,一缕青烟,袅袅升起,让远方的游子,从心底浮出一阵暖意,直看得眼睛模糊了,用手去抹,怕人看到,说一句沙子到眼里了……我读这首诗,还是后一种情感更多一些,大概没到历史中走过几回,只是生活中多了些对炊烟的情感细节。

那是在陕北当知青的记忆。山岭如一波一波的海伸向远方,说这个比喻给你听,是让你对山岭有个画面感。其实,在山上千活感觉不到海的延泽,而是烙饼子的炉子,上面反扣一口大锅,

什么没吃没喝的日子,到处都是些尿盆子散味儿。烟囱的模样虽不好看,用外大着呢,在陕北,窑洞里的灶再加上烟道,就是排风道,还是鼓风机。因为烟囱是从挖在山里的窑洞从下面直通到坡面上形成一个通风道,扣上个窑瓮,让别人知道从下面伸上来一个排风口。从山里的窑洞到让烟道伸出露天,高度不低,所以抽风很强,一把柴火丢进灶,呼呼的风抽得窑洞的窗户纸都在抖。因此,烟囱还是通风设备,取暖设备。没有了烟囱的窑洞不能住人,叫没有人气。没有人的窑洞很快就会倒塌,老百姓说,窑洞也要有口气才能活哩。

烟囱就是出气筒,但一度还是工业

大家小品

风景线上的烟囱

叶廷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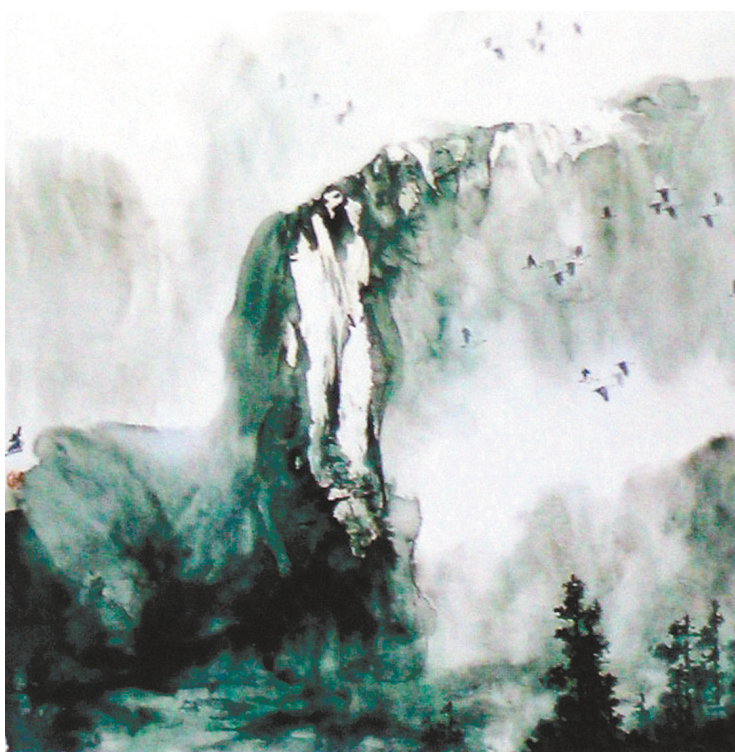
我们就在上面烙着。到了正午,汗水在脸上成了盐粒,那个名叫饥饿的老熟人就一次次叫人回头,回头望村子。村子在沟底,看不见村头的树也听不见鸡犬之声,只是当一家一户的炊烟气喘吁吁爬进我们的视线,喂,快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行了。这时候炊烟的人情味最浓。带工的队长也就顺势说一句:“再加把劲,没看到灶洞冒烟了吗?”

农村的烟囱都不美,能冒烟就行。在吃饱穿暖还是理想的时候,住的窑洞也就是个遮风挡雨的窝罢了。见过农村里的大瓮么?杂技演员脚下蹬着的那种,半人高,下面有底,上头齐齐地敞个大口,能装水,装米,还能装进个人,杂技演员和《沙家浜》里的胡传魁都在里面待过。在我插队的村里,有的人家窑洞的烟囱都是半截瓮。在那时,常听见这么一个顺口溜:“掌柜要是打烂瓮,准保两头都有用,下头半截当尿盆,上头是个好烟囱。”这让我记了一辈子。因为那年月,人们也常说另一句话,坏事能变好事。老百姓给这句话加上个顺口溜的注解,实在是高明。不是吗?那些当官的一出错,就来个交学费,说是又让坏事变成了好事。这下子,他瞎指挥让地里不长庄稼只长草没关系,你要提意见了,他就说:“这不是坏事变好事了么?阶级敌人自己跳出来,不斗行么?”当官的这一套理论那一套学说,一套套说得深沉能蒙人。其实老百姓知道是你当掌柜的打烂了瓮,也知道为

化的象征。记得小时候,国家在宣传工业化,有一个最简单的图案,厂房是锯齿形的一排屋脊,那是棉纺厂的厂区,后面是一排大烟囱,那是热电厂的机房。这幅构图曾是我们心中的憧憬,只是真的到了这一天,棉纺厂太多,要压锭,热电厂污染大气,要改造。唉,大烟囱也是风流倜傥过的角色,别忘了这点,当我们风光正好,风头正足的时候,会不会只是个烟囱二世呢?

对烟囱记忆最深的是我上世纪70年代生活在秦岭山区一家化工厂的日子。工厂生产硫酸和磷肥,排出的都是要命的气体。工作了4年,我的牙被磷肥车间的废气熏坏好几个。在最困难的年月,工人们还能领到肉、鸡蛋、糖和油等保健品,许多工人便把他们在农村的老婆孩子接到厂里来闻大烟囱冒的气味。那时管理不严,弄几卷油毛毡搭个小工棚,有肉有蛋的日子过得挺开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工厂旁的几个穷山村也沾了大烟囱的光。自从工厂开始冒烟,村民们只把地翻一次再撒几颗种子,不管了。因为秋天越是颗粒无收,只长社会主义的草,工厂赔款越多。在我离开那厂时,原先连补丁衣服都没有两套的村民,家家拉上了电,户户通了自来水,人人都穿上了工厂的工作服。啊,那时烟囱有多少人爱它!

曾是生活大角色的烟囱,现在越来越少了,各领风骚的时代啊。



雁南飞(国画) 赵燕

我们经常听到说拗口令或称绕口令的,如“盆碰瓶,瓶碰盆”之类。其实,拗口令古已有之,它不仅是一种语言游戏,而且有的文人还故意写成拗口令。这种诗虽然读起来特别别扭,但细细琢磨,却有特殊的韵味。

文苑摘英

拗口令诗趣谈

明代有更多的文人作拗口令。“黠子向客苦吟口,漆笔墨蜜手柳酒。”就是人们常提到的明代文人文翔凤所作的《口吃诗》中具有代表性的句子。明代的谢肇淛曾作有《赠口吃孝廉》五言诗二首。其一云:“绿柳楼老,林萝岭路凉。露来蓬漏冷,两泪落刘郎。”其二云:“黎岭连连路,兰陵累累楼。流离怜冷落,郎攀懒来留。”另有徐氏文士作《赠口吃孝廉》五言诗一首云:“留恋兰陵令,淋漓两泪流。岭萝凉弄嫩,路柳绿连楼。”谢、徐的三首诗中,除“攀”、“弄”二字以“N”为声母外,其余全用“L”为声母的字。读起来特别拗口,不仅口吃的人难念,即使口齿伶俐者想流畅地念诵,也是很不容易的。当然,这种形式的诗,文字游戏的成分太浓,没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它毕竟是我们祖先智慧结晶的一部分。



塞上生灵 范惠吉 摄影

等待,似乎和现在快速发展的社会格格不入。等,就是荒废光阴,时不我待呀!

我们时常会看到,十字路口片刻的红灯,让很多人等不及。我们都有过这样的叹息,好端端一个或年轻或饱满的生命,瞬间结束在十字路口。

年轻人最害怕等待。在大学里,他们急着想早一天走出校门,唯恐抓不住剩下的就业岗位。参加工作,他们又梦想着能一夜暴富或者功成名就。在年轻人中,可以做到静如处子而专注于自己手头办公事者寥寥无几。他们常常把提拔、晋升挂在嘴边,掰手细数自己“奉献”的日子。如今年轻人换工作比换衣服都勤。

眼下,不是流行这样一句见面语嘛:呵呵,你还在那儿呀?言外之意,没有发展,你别吊死在一棵树上。光等不行,会让人笑话的。

等待

魏峰

在农村,村庄稼有一种现象,叫蹲苗,很有意思。在某个时期,农民为了防止秧苗疯长,就控制施肥和灌水,进行中耕,使幼苗根部下扎,促进生长,达到苗齐、苗壮,为夺取高产打好基础。

事实上,任何事物任何人的成长,都得有个过程,或者说有一段相当长的时

间。蹲苗,是最好的等待。

我就认识一个朋友,他在单位并不算上优秀,可是他踏踏实实一干就是十年。这十年间,和他做同事的一拨拨大学生做过眼云烟,来去匆匆。如今,他却成了几个大学生的领导。等待,终会让人成熟,成功。

会等待也是一种智慧。会等待,已经成为当下众多成功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如果,现在你的人生或者事业犹如花儿一样美丽,那就请你耐心地等一等,当充足的阳光和丰富的雨露慢慢浸入你的肌肤的时候,你迎来的必将是一个果实累累的金秋。

民国初,郑州因铁路而兴,向四方延伸,为商业提供了集散交流的条件,棉花市场红红火火地繁荣起来。一业带动百业兴,国货、京货、洋货及其外来的舶来品,源源不断涌入。与此同时,京、津、沪、汉口、开封出版的报纸和郑州地方报刊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相继在郑发行创刊,外界的新生事物在郑州层出不穷。而商家对市场的激烈争夺,催生了广告业的应运而生。早年,郑州市场上出现了专门经纪人,他们来往于报社与广告主之间,联络约稿,代办广告业务,广告社、广告公司逐渐形成,并随着市场的日益兴盛而发展。据业界老广告人回忆:20世纪20年代,郑州市市场上已有的广告公司,是由湖北武汉广告业巨头楚阳海广告总公司在郑通商巷设一分公司开始的。由于该公司有雄厚的实力和相关专业人才,垄断

了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建筑物墙面上绘制产品广告、车站及列车上设置固定广告牌,利用这些广告宣传产品,让做广告的商家尝到了甜头,引起众多商家的关注和参与。广告公司从中获利颇丰。楚阳海在郑的广告业务打开局面后,又渗透到报纸广

早年郑州的广告公司

杜丰芮 王瑞明

告。老郑州有些报社的内外勤广告业务人员,借楚阳海的名气和影响,经常合作,招揽广告业务。有的报社还将双方业务员的名字登载于报端,抬高他们的身份。楚阳海广告分公司为扩大业务,还开办了郑州最早的“美术广告画会”,招收年轻学生进行专业培训,这在当年可视为创举。

进入20世纪30年代,郑州的广告业务步入多元化。郑州规模较大的五洲书报社广告部,也开始经营起广告业务。它的业务凭借着在河南各县

设立有70多家分理处,经销报纸总数达两万多份的优势,使老郑州广告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又带动了一批批小的广告社、广告室、画室相继开业,使郑州广告业进入全盛期。抗日战争爆发后,郑州的广告业生意萧条,直到1948年郑州解放后,广告业才逐渐得以恢复。

老郑州广告文化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几位来郑的画家、设计师的闪光足迹,他们才华横溢,各擅所长,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素养。汉口画家蔡仲新,设计的墨图招贴广告画,十分惹人注目。天津设计师顾长兴,巧妙运用风景画与几何图案结合,设计出商品广告富有传统文化韵味。上海来的王玉才画师在月份牌画的创作上是业内高手,作品笔触老练而细腻,很受市场的欢迎。开封著名设计师刘沛丰吸收不少现代派思想,专门为商品设计产品包装,讲求色块的对比,很能取悦购买者。这些在老郑州商界都曾留下历史的记载。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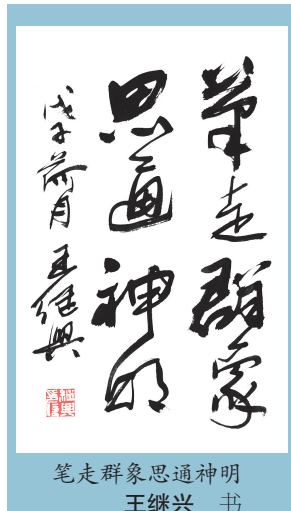
《我的名字叫建国》

刘峰颖

在中国,有90万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建国。《我的名字叫建国》从取名“建国”的独特角度,记述了60个普通中国人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情感、理想、命运故事,发掘出人民与共和国的血肉情怀。

为了迎接国庆60周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全国范围内特别组织了“我的名字叫建国”大型征文活动,从名叫“建国”的同胞中,根据行业及年龄层次发掘出60个代表人物,从名字的角度,让普通中国人讲述

自己的人生往事、家国往事。图书用自述者原汁原味的文字、珍贵的老照片,唤起国人60年来的回忆,将个体体验与重大事件融合起来,展现出人性与时代发展进步的脉络,成为文化学的60年生活史。取名建国,不仅承载着父辈们的心愿和祝福,也寄托了对祖国繁荣昌盛的希望。这是一本普通中国人的“写真集”,它以民生、民声、民间的形式,从深处发掘出人民与共和国的血肉情怀。



笔走群象思通神明 王继兴 书

倡导精神文明 共建和谐社会
中共二七区委宣传部 特约刊出

连载

吃饱喝足回来的路上,男生们开始嘀咕。“要不还是告诉她吧——人家要是自己发现就不好了。”有人提议。我打算告诉她,可一上来没敢说实话,先绕圈子。“你丢了东西没有?”其中一人问。

“没有啊。”她说。“肯定?”“我看看吧……”她开始检查自己的包,“没有,东西都在。”她很诚实,连父母给她留了一些银元的事儿也说了。我们开始慌了。“天哪,那是谁的呢?”突然其中有位男生想到了什么。“但愿不是我们那位小气鬼鬼儿的吧?”他呻吟道。

吴世良和我在天津下火车时,队里有一位同学吝啬是出了名的。结果还正是他丢的银元,我们的担心成了真。可不告诉他也不行。“怎么办?”其中一位男生说。“没别的辙,还他呗!”我说。“可谁有钱呢?”另一位男生说。

我知道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自告奋勇。“我爸走的时候,也给我留了几块现大洋。”我说。那是吹牛。他留给我的其实是只金表。我记得那牌子是“爱尔金”。我和另一位男生去了一家钟表店,问店主他能出多少钱。人家兴趣索然,因为当时时局还不稳定,人民解放军刚进北京,开国大典还没在天安门举行,那要等到10月份。同学劝我不要以这么低的价格卖出去,可我没别的办法。

我还是卖掉了我父亲的表,因为我不想给我未来的妻子留下坏印象。吴世良直到我们结婚时才听说有关这块银元的故事。她认为我把父亲去台湾时留给我的唯一信物卖掉很不明智。当然,我并不知道她再也见不到他。

3月,我们在北京城里各个大学巡回演出约一个月后,被告知可以回家了。新政协正在起草新的宪法,新的共和国就要成立。几个星期和同学们在一起无拘无束的这段时间里,吴世良和我的关系也超出了一般的友谊。可眼下我们却面临着分离,因为她必须去天津和她父母团聚。她上清华后,她父母一直希望回南方,她在杭州、苏州、昆山都有房,唯独不能回上海,因为那样会招致当局的迫害。他们天津坐困实际上是一种政

心激动得直想跳出来。高新高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对孟先生说:“老五啊,这回咱看的可是省级队的比赛啊,这些球队的水平可都比我高多了呀,你今天好好看看,好好看看,看看人家是咋踢球的。”

孟先生看着像小孩一样眉飞色舞的高新高说:“三哥,球赛还没开始,你激动啥?别激动,别激动,等会儿看球时再激动。”

高新高点点头,连声说:“中、中、中,不激动,不激动。”

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已经到了比赛的球场,球场里负责维持秩序的不再是警察,而是武警战士。高新高坐着三轮车来,是个残疾人,武警战士就特许高新高在看台的最下面看球,孟先生坐在离高新高不远的第二排看台上。

比赛开始了,是河南省足球队与天津市足球队的比赛。两个队打得很顽强,球技也不错,但到了最后,河南队的守门员在关键时刻拦球失误,让天津队多进了一个球,比赛结果是2:1,天津队胜河南队。

看球者大部分是热爱足球的河南人,对于河南足球队的人败,坐在看台上的河南人都有些遗憾。高新高的心情也许比看台上的人更复杂,他看到河南队输球时,情绪激动得直拍三轮车的车把,嘴里不由自主地叫着:“咋打输了呢?咋会打输了呢?”

说着话,他已控制不住自己,用手转动三轮车来到了球场上,发泄自己内心的激动和遗憾之情。

也许一开始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看球上了,没有注意到高新高也来看球了。当高新高转着车子走动着在足球场上时,看台上看球的球迷发现了高新高,有许多人认出了他,叫出了他的绰号“小老高——铁把门”。于是,球场里突然爆发出发意想不到的震耳欲聋的喊叫声:

“小老高——铁把门!”
“小老高——铁把门!”
“小老高——铁把门!”
……

高新高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么多年不踢球了,郑州的球迷们还没有忘记自己当年在足球场上赢得的光荣而骄傲的绰号,更想不到他们看见自己会如此亲切、如此激动。

在众人的呼喊声中,高新高挥挥手站立在看台上的球迷们致敬。那一刻,高新高热血沸腾,泪流满面……